



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之建構

王芊文¹、陳品潔^{2*}、葉思妤²、王毓君²、邢志彬³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研究生¹

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畢業生²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助理教授³

初稿收件：2022 年 03 月 30 日；正式接受：2021 年 07 月 30 日

通訊作者：陳品潔；任職機構：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畢業生

通訊地址：新北市三重區河邊北街 100 巷 1 號 3 樓

電話：02-29726395；電子郵件：pipi25baby@gmail.com

摘要

鑑於近年情緒勒索之議題逐漸受到關注，本研究藉由文獻回顧，瞭解華人社會人際互動中情緒勒索之概念與現象，並試圖建立一套可供自我檢測之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期望能提升社會大眾對人際互動情緒勒索之重視程度。本研究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先藉由情緒勒索之相關文獻回顧與分析，建構出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的構念與題項，形成 7 個構念、以及預試量表的 72 個題項；第二階段則是實際以台灣 18 歲以上成年人為研究對象，透過網路問卷調查蒐集 438 位受測者之回覆。資料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共保留 32 題項。本量表經由項目分析刪除 2 題題項，因素分析刪除 38 題題項，萃取出 4 個因素，最後形成 32 題之「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分別為「自我價值與自信」15 題、「人際互動恐懼感」7 題、「同情他人」7 題、及「人際關係安全感」3 題，整體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43，變異解釋量為 62.46%。本研究結果發現，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包含四個面向，（1）自我價值與自信、（2）人際互動恐懼感、（3）同情他人，以及（4）人際關係安全感。最後，研究針對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量表實務應用與未來研究之相關建議。

關鍵詞：人際互動、情緒知覺、情緒勒索、量表編製

壹、緒論

近幾年來，「情緒勒索 (emotional blackmail)」一詞在台灣受到大眾廣泛的使用與討論，市面上出現許多探討情緒勒索議題的書籍和網路文章。而根據《今周刊》委託 Pollster 線上市調網於 2017 年所做的問卷調查 (林鳳琪、王炘珏，2017)，結果顯示有 92% 的人在人際關係互動中，曾有過度委屈自己、習慣自我懷疑等被情緒勒索的感受；約七成受訪者認為自己在沒有達到他人的期望時，會產生罪惡感而否定自己；有近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來自父母的情緒勒索最難拒絕，其次是來自上司 (15%)、伴侶 (14.2%) 的關係。所以，情緒勒索是在描述一個普遍存在於關係現象的負面感受。

進一步探究，情緒勒索係 Forward 在 1997 年所提出的概念，意指在人際互動的過程中，其中一方不願意為自己的負面情緒負責，企圖以威脅、利誘、傷害等方式迫使對方順從並令對方感到不適的行為模式，此概念解釋人際互動中雙方關係的拉鋸，並可能發生在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當中 (艾昌瑞等人，2015)。Forward (1998) 曾用恐懼 (fear)、義務 (obligation) 與罪惡感 (guilt) 描述為情緒勒索者的主要工具，「如迷霧 (fog) 般」之雙關語意，比喻被情緒勒索者從中體會到「恐懼」、「責任」、「罪惡感」三種感覺，令人覺得無處可逃、無所適從，感到痛苦和壓力，如同置身使人摸不著頭緒的迷霧當中。換言之，處在關係中被情緒勒索的一方，常會感覺到無法自處、戰戰兢兢，甚至可能促發嚴重的心理壓力，產生焦慮、憂鬱、絕望等負面情緒，所以，對於人際互動之間有關情緒勒索議題的必要性。

一、情緒勒索議題對華人文化脈絡之重要性

由於受到儒家關係主義的影響，華人社會的人際互動中，相當強調個人在各個角色關係中的義務 (黃光國，2004；王秀槐，2015)；而華人文化中的情緒勒索現象，便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人際關係的「角色義務」之上，例如任庭儀 (2018) 的研究探討親代對子代的情緒勒索經驗，研究顯示父母會以自己教養子女的责任、子女有孝順與回報父母的義務為理由，引發子女的責任感、愧疚感、罪惡感等感受，進而成功控制子女的行為。而在親密關係中的伴侶有滿足對方情感需求、維持關係的義務，當另一半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時，會因考量彼此情分、擔憂關係破裂、或不希望伴侶感到失落難過而選擇隱忍退讓 (蔡秀娟，2019)。華人組織中部屬被期望應該要順從效忠於主管、主管則要展現權威管理部屬 (林佳樺、姜定宇，2019)，因此當上司出現惡意責罵、貶低、壓榨下屬等行為，下屬多半會忍氣吞聲，甚至認為是自己能力不佳造成的，進而失去自信，產生恐懼、焦慮等不安全感 (艾昌瑞等人，2015；孫蓁蓁，2020)。而陳思婷 (2020) 則是探討臺灣軍事組織中潛藏的情緒勒索現象，研究發現華人社會獨有的仁慈領導風格會使部屬產生義務感及罪惡感，長官基於上位者的角色義務而做出的施恩行為，會引發部屬的感激與愧疚，使部屬出現超義務行為回饋。

從實證研究的調查不難發現，情緒勒索的現象普遍存在於華人社會的互動之中，華人社會尊崇權威、提倡孝順 (陸洛等人，2006)，同時也講究和諧 (蔡秀娟，2019)、犧牲與忍讓 (任庭儀，2018)。周慕姿 (2017) 也提到在華人社會的背景脈絡使得人與人之間更容易流於情緒勒索的相處模式。因此，如何辨識情緒勒索的關係情況，對於發生情緒勒

索機率較高之華人族群而言更顯示其重要性。只是非常可惜的是當前的文章與書籍向大眾分享如何判斷自己是否被情緒勒索或情緒勒索別人的方法，讓讀者檢視自己是否具有容易被情緒勒索的性格特質，唯性格取向乃是個人在情境脈絡下的特定行為樣態，加上讀者可能未具備心理學相關知識背景，由特質進行自我判斷，難免會有誤用之情況，所以逐漸出現情緒勒索相關量表工作的研究，像是嘗試編製出情緒勒索傾向問卷（Liu, 2010），該量表表示從他人與自我的互動中感知情緒勒索的感受；而職場情緒勒索認知問卷（陳怡伶，2004）則是以職場為焦點場域，進而判斷職場遭受情緒勒索的經驗；另外，易被情緒勒索類型問卷（柯小萍，2009），則是以 Forward 的理論進行建構進行情緒勒索經驗分類，但是，即便已經有學者投入於量表研究，許喻淇（2013）仍認為目前尚未發展出一套完善的情緒勒索量表。

由於情緒勒索目前仍屬於較少人探討之新興研究議題，未有發展完善之量表。比較國內外情緒勒索相關議題量表之編製情形，有些學者（陳怡伶，2004；柯小萍，2009）先透過訪談了解受訪者在職場上遭遇的情緒勒索經驗，並依照情緒勒索者種類（上司、下屬、同事、供應商、客戶）劃分，形成職場情緒勒索認知或程度量表，此種量表能幫助研究者探究在職場領域中情緒勒索的主要類型與來源，但該問卷限制為只適用於職場且無法普及不同類型企業的職場情緒勒索情形。而有些學者（陳思婷，2020；許喻淇，2013；Karnani & Zelman, 2019）則沿用 Forward（1998）的 FOG 論點，將情緒勒索區分成恐懼（fear）、義務（obligation）與罪惡感（guilt）三個向度，形成情緒勒索問卷，研究者可藉由問卷調查關係中是否存在情緒勒索之現象；但許喻淇（2013）的問卷是以職場做為情緒勒索發生的假想情境，Karnani 與 Zelman（2019）則是以情侶為研究對象，而陳思婷（2020）則是針對軍事組織中人際互動經驗進行題型設計，因此問卷使用上可能無法推廣至其他種互動情境與組織文化。另有其他研究（柯小萍，2009；林瑞塘，2014）以 Forward（1998）提出的受情緒勒索類型（依賴贊同者、爭論平息者、怪罪自己者、濫用同情者、自我懷疑者）作為測量構面，發展出易受情緒勒索類型特質量表，但受情緒勒索類型的區分實為 Forward 的個人經驗論述，以此作為量表建構之基礎可能會有所偏誤。

雖然情緒勒索可能發生在各種關係情境之下，目前的研究（任庭儀，2018；Karnani & Zelman, 2019）多半聚焦於情緒勒索在商業、職場領域的探討，其餘領域之情緒勒索相關研究仍需待投入。比起工作關係的探究，家庭關係對於華人族群亦存在其重要性。不過，要在各種不同的人際關係內探討情緒勒索的樣態，進而促進社會大眾對於關係的覺察與自處性，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實非易事。茲此，本研究嘗試以「易被情緒勒索者的特質和傾向」作為探討的重心，期盼能設計出一份具有良好信效度的量表，以了解易被情緒勒索者較可能具備的人格特質，並建立起完善的情緒勒索自我檢測量表，進一步提供給社會大眾有效分辨出自己是否具有被情緒勒索的特質和傾向，協助察覺自己是否正陷入被他人情緒勒索的互動模式之中，間接增進心理健康的程度。

二、情緒勒索相關研究之探討

Forward（1998）最初對於情緒勒索的定義為：「宰制行動中的一種最有利形式，周遭親朋好友會用一些直接或間接的手段勒索我們，如果我們不照他們的要求去做，可能會

遭受到苦頭」(杜玉蓉譯, 1998/2017, 頁 34)。所以, 情緒勒索者會以施暴者、自虐者、悲情者、及欲擒故縱者這四種型態出現; 相對的, 被情緒勒索者則容易出現依賴贊同者、爭論平息者、怪罪自己、濫用同情心、及自我懷疑者這五項常見的特質。但是, 從林瑞塘(2014)的實證研究中發現, 華人情緒勒索的特質, 並未能全然適用, 像是使用易被情緒勒索類型問卷時, 「爭論平息者」此一構面就被排除, 換言之, 情緒勒索的特質與主觀經驗存在跨職場與文化的差異性。情緒勒索的相關研究在國內外都較為缺乏, 研究者回顧過去文獻, 多是以職場情緒勒索、消費過程受情緒勒索為焦點進行探討的研究, 少數研究則是聚焦在親密關係、社群人際關係的情緒勒索。

第一個關於職場情緒勒索的研究結果, 像是陳怡伶等人(2005)以內容分析法研究職場情緒勒索的來源, 將其來源分成五個關係類項, 依據所佔比例由高至低分別為: 上司、客戶、同事、下屬、供應商, 各自比例為 43.14%、25.49%、17.65%、7.84%、5.88%, 從數據可知, 上司是員工知覺情緒勒索最大的來源。所以, 柯小萍(2009)探討被上司或同事情緒勒索與工作績效之間的關聯性, 設計出「職場情緒勒索程度量表」、「易被情緒勒索類型量表」, 研究結果顯示職場情緒勒索會負向影響工作績效, 被情緒勒索者容易具有怪罪自己、濫用同理、爭論平息的特質。艾昌瑞等人(2015)則是設計出「情緒勒索情境與 FOG 情境式問卷」, 包含懲罰威脅式、自罰威脅式、自虐威脅式、哄騙誘脅式四種情境, 將情境問卷分成擔憂害怕、責任義務、內疚自責三個構面, 探討員工面對職場中人際不當要求的情緒狀態。另外, 林瑞塘(2014)針對雲林縣國小教師受到職場情緒勒索的來源與類型的研究, 發現教師感受到情緒勒索的主要來源來自於家長。而較新的研究(孫蓁蓁, 2020), 也是聚焦在職場組織的情緒勒索。只是上述研究皆聚焦在職場的人際互動之情緒勒索經驗。

陳怡伶(2004)以焦點團體訪談法、內容分析法, 提出職場情緒勒索有從屬關係、伙伴關係、客戶關係等三個構面, 並分為付出代價報復型、自私自利傷人型、以死要挾毀滅型、要求別人關懷型、剝奪他人權力型。Liu(2010)從實證角度向 299 位員工調查情緒勒索知覺和幸福感的關聯性, 研究結果顯示兩者呈現負相關。綜言論之, 情緒勒索可能存在的於職場任何關係屬性中, 除了降低公司與員工的生產效能之外, 更可能促發當事人的心理壓力、降低生活幸福感。

消費過程受情緒勒索的情況則是另一個投注較多的研究範疇與領域, 例如: 劉仲矩與莊心宜(2016)針對消費者情緒勒索知覺與購買意願之關聯進行探討, 發現具有剝奪權利、關係控制、服務破壞、言語勒索等四個因素的關係內涵, 結果顯示消費者情緒勒索知覺中的「關係控制」對「購買意願」有顯著關聯性。而 Chen(2009)則是透過 Q 分類法和深層訪談法, 將業務員對來自顧客的情緒勒索的種類與內容進行分析, 依據研究結果把顧客分成運用關係型、主導型、要求公平對待型、運用時間壓力型以及威脅型五種情緒勒索類型; 另一篇探討馬基維利主義與銷售員情緒勒索傾向之關聯性的研究, 發現兩者是呈現顯著正相關(Chen, 2010)。較近期的研究(劉仲矩, 2012), 則是蒐集顧客在美容美髮時受到員工情緒勒索對待的經驗, 並使用層級分析法探討員工服務破壞行為重要性排序, 發現顧客知覺員工服務情緒勒索行為重要性依序為態度不佳、比較服務、時間問題、肢體語言、關係利用。

在第三個研究領域則是有關於親密關係情緒勒索的結果，像是 Karnani 與 Zelman (2019) 針對居住在香港的情侶，探究情緒勒索量表構面以及情緒勒索與操縱策略量表、婚姻末日四騎士量表、情侶滿意指數之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情緒勒索與情侶滿意指數呈負相關。而黃燕茹等人 (2019) 則探討酒精使用障礙症個案與家屬家庭互動關係中情緒勒索的現象，結果發現威脅、悔恨、責備三個構面，三個構面兩兩相互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該研究亦同時使用質性訪談法，深入瞭解酒精使用障礙症案的家屬置身情緒勒索情境的感受，研究結果發現性別、關係親近性、酒精使用障礙症個案酗酒量與家屬覺知情緒勒索具顯著相關性。蔡秀娟 (2019) 探討華人文化裡情緒勒索對親密關係的影響，設計情境問卷，以被情緒勒索者的義務感、愧疚感這兩種情緒感受作為依變項，發現當個人於關係中感受到的愧疚感越高時，越容易採取順從行為以滿足伴侶需求；感受到的義務感越高時，越容易覺得關係中的兩人是親近的、維持關係的意願也越高。

最後，嚴心好 (2020) 在進行網路社群情緒勒索知覺之研究，分析網路社群情緒勒索知覺與退社群傾向之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網路社群情緒勒索知覺及網路社群心理壓力對退社群傾向呈現部分顯著正相關，網路社群心理壓力對網路社群情緒勒索知覺與退社群傾向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綜上論之，情緒勒索的現象可能在職場關係、親密關係、社群虛擬關係中產生，而人在生活中時時刻刻都處於各種關係的面向之中，所以呼應本研究的目的，欲從情緒勒索的概念著手，企圖建構出適用於日常生活各種人際關係的情緒勒索量表，一來可以回顧與整理當前情緒勒索的研究基礎，二來亦可以提高情緒勒索受重視的程度，並進一步被應用在心理健康相關領域中。

三、情緒勒索因素形成與面向

本研究自行編製之「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一共包含七個構念，分別是：自信、自我價值、恐懼、責任感、罪惡感、安全感、同情心。量表編製過程主要參考情緒勒索相關書籍與國內外提及情緒勒索之相關文獻資料。以下依序對每個構念的文獻依據、定義、程度描述和命題進行說明。

1. 自信：Forward (1998) 描述易被情緒勒索宰制的人格特質，其中一項為「自我懷疑者」，情緒勒索者利用此特質，使被情緒勒索者向其屈服、依賴對方的意見做決定，也不去質疑對方需求的真實性，陷入自我懷疑的循環之中。而程致綱 (2014) 認為自信是指個體對自己特質的信念，換言之，自信是屬於個體對自己的看法，包含對自己能力的認知 (Weinberg, 2009)、自我的感覺 (Basch, 1987)、自我的肯定 (張春興, 2011)。所以，本研究研究者認為「自信」程度的高低，可以視為是易被情緒勒索者所展現的一項人格特質。

2. 自我價值：周慕姿 (2017) 認為「自我價值低落」的人，容易陷入被情緒勒索的困境之中。林杏足 (2003) 將自我價值定義為個體對自己的重要性的接納之心理傾向；個體對自我之價值感反應在其自覺被愛、被接納、被重視的程度及對自己存在價值與重要性的認可。研究者將自我價值定義為「對自我的評估和接納，以及尊重自我的態度」，並視為是重要可被觀測的人格之一環。

3. 恐懼：恐懼被視為是情緒勒索的一項重要知覺。人類傾向於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

因此與生俱來便具有對於「被排擠的恐懼」，產生無助感、被拋棄感，容易使人陷入不停被情緒勒索的互動模式中（Forward & Frazier, 1998）。除了被排擠的恐懼外，人們「對憤怒的恐懼」也能夠成為情緒勒索者控制對方的利器，像是 Forward（1998）認為易被情緒勒索類型中的「爭論平息者」，即容易因「害怕別人生氣」、「壓抑自己情緒」、「不願與他人發生爭執」、「害怕關係破裂」等緣由而陷入被情緒勒索的循環。而對恐懼的知覺則出現在 Karnani 和 Zelman（2019）所編製的情緒勒索量表、柯小萍（2009）的「易被情緒勒索類型量表」中，皆強調易被情緒勒索者知覺恐懼之重要性。

4. 責任感：Forward（1998）認為個體容易受到社會規範與價值觀的約束，當個體在衡量自己對他人的責任時，可能會因義務或外在行為規範而做出非理性的抉擇或犧牲，而其中的責任感便是一項重要的人格特質（廖佩珊、蔡易佑，2014），像是譚小宏等人（2005）也呼應於此，將責任感視為一種「自覺把份內的事做好」的人格特質，其份內應做的事包含法律明文規定與道德規範、角色規範的形式規定，個體對自我應負責任的自覺意識與積極履行的行為傾向（劉國華、張積家，1997）、以及角色職責與覺知（張良才、孫繼紅，2006；Schlenker et al., 1994）。本研究參考上述文獻資料，將情緒勒索中的責任感定義為「替不是自己引起的問題負責、過度為他人犧牲奉獻」，對此也呼應 Karnani 與 Zelman（2019）的量表架構。

5. 罪惡感：當一個具有良知、負責任的個體違反了自我或社會的規範，罪惡感就會使人產生不舒服與自責的感受（Forward & Frazier, 1998），同時也是情緒勒索面向中重要的一環（蔡秀娟，2019；Karnani & Zelman, 2019）。其中，罪惡感跟悔恨的情緒有密切的關係，像是罪惡感是個體認知到自己在道德上做錯決定，所產生的悔恨情緒（Olthof et al., 2004），而 Forward（1998）認為情緒勒索情境中出現的罪惡感，就像是過度敏感的汽車警報器；情緒勒索者透過將所有抱怨、不滿都推給被情緒勒索的一方，在不符事實的情況下指控對方傷害了他，使被情緒勒索者只能盡可能順從對方、滿足要求，藉由對關係的挽救、補償來消弭罪惡感引發的不適。所以，Bybee（1998）視罪惡感為個體意識到自己的意願或行為已違背道德標準時，產生的一種道德情緒。當人們感受到罪惡感時，通常會透過行動來補償或修復自己所造成的傷害，以抒解罪惡感帶來的痛苦與不快（彭惠鈺，2020）。

6. 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種從恐懼和焦慮中脫離出來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覺，特別是滿足一個人現在和將來各種需要的感覺（陳順森等人，2006）；而方志揚（2019）進一步指出安全感一詞通常用於人際關係間的情緒行為，彼此關係越深，越容易因為害怕失去對方而感到不安全。Schein（2010）也認為當人們面對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時，心理安全感會影響人們感受焦慮的程度。所以，周慕姿（2017）提到在情緒勒索的互動循環中，安全感是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元素。情緒勒索者會利用對方「最在乎的事情」來進行威脅，這個「最在乎的事情」可能是認同、愛、關係、工作、名聲等。情緒勒索者藉由宣稱要奪走對方的重要事物，使被勒索的一方感受到焦慮、害怕，產生不安全感，基於此緣由，本研究將不安全感設定為所欲了解的人格特質之一。

7. 同情心：憐憫和同情會激發人的善良本性，同時也有可能造成困擾，因為同情心會讓個體為了他人而放棄自身利益（Forward & Frazier, 1998），石中英（2010）則認為同情的產生有助於激發旁觀者發現或重新發現其與當事人之間休戚與共的親密關係，並努力

做好分享當事人成功或幫助當事人減輕痛苦的準備。所以，同情心可能會成為被情緒勒索的特質之一，此一呼應柯小萍（2009）的量表發展概念。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與構念面向，形成本量表理念，其中可分為三個範疇，（1）個體對於自我的認識與看法（自信、自我價值）、（2）個體在與他人人際互動過程中的知覺（恐懼、罪惡感、安全感）、（3）個體對他人產生出想要幫助對方的動機（責任感、同情心），三個範疇作為本研究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之基礎，並編製相關題項、信效度檢測。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深入檢視情緒勒索的概念與意義，以「被情緒勒索者」為研究重心，探討比較容易受到情緒勒索的人格特質傾向，參考相關理論、文獻、量表與實務現況，嘗試發展出適用於華人文化的測量工具。

人格特質具有主導個體外顯行為之作用，依據 Sullivan（1953）的人際關係理論，一個人的人格表現只有在與他人的互動脈絡之中才能洞察；個體在人際交往中面臨吸引、排拒、合作、競爭、比較、衝突等情境時，會依自身性格特質而引發不同認知，繼而採取相對應的因應策略。因此本研究欲從個體的主觀知覺著手，讓受測者評估自己在平日人際互動中容易展現出的性格傾向、習慣反應、行為模式，期盼能夠使受測者對於自己的人格特質、易受情緒勒索的程度能夠有更多的了解與自我覺察；亦可作為自我評估之參考，協助受測者檢視自己是否曾經或正在成為人際互動中被情緒勒索的一方。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與抽樣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台灣 18 歲以上成年人為研究對象，但未設限其性別、職業等人口變項。Schmidt（1997）提到網路問卷調查有其便利性，但是李政忠（2004）認為網路的問卷調查無法取得抽樣架構，但是可以由增加樣本數增加其推論至母體的接近性。研究者為增加問卷之樣本數架設於網路平台（google 表單），透過各地區認識之人員於 Facebook、Instagram、Line、Plurk 等社交平台填寫問卷，問卷開放時間為 2019 年 6 月 11 日下午 2 時至 6 月 14 晚上 8 時，總共收到 438 份回覆。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參與的研究對象中，女性佔 80.6%；職業以學生 37.6% 最多，其次為服務業與家管，各佔 12.1%。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以 20 至 24 歲最多，佔 28.5%，其中最年輕為 18 歲，最年長為 53 歲，平均年齡約 29 歲。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具，乃是自行編製之「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問卷量表共計 72 題，包括自信 11 題、自我價值 10 題、恐懼 10 題、責任感 10 題、罪惡感 11 題、安全感 10 題、同情心 10 題。各題項的計分方式採用李克特四點量表，所有題目皆為正向題，其中 1 分代表非常不符合、4 分代表非常符合，請受測者依照自身實際情況進行填答，分數越高，表示在人際互動中受到情緒勒索的可能性越高。本量表設計完成後，由一位具有諮商心理學背景之博士進行題目的檢核，完成初步專家效度。本研究後續進行因素分析，

以進行華人族群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的理解。

四、研究程序與倫理

本研究先將編製之初版問卷完成專家檢核後進行施測，先進行項目分析、刪除部分題項，接著探索性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確認因素數量，再以平行分析檢核因素量保留的標準，接著完成第二次的探索性分析、刪除題項。本研究在蒐集資料過程亦遵守研究倫理規範，除了填答者在知後同意之下進行填答之外，填答者的資訊予以隱藏、資料的保存亦具有嚴謹性。

參、結果與討論

一、結果

研究者先採用一致性考驗法進行項目分析，藉由題項與其他題項總分的相關係數，並參考全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作為保留題項的標準，結果發現在「自信」、「恐懼」、「責任感」、「安全感」、及「同情心」的特質方面，全量表內部一致性分別為 .925、.922、.860、.921、.887，刪除任 1 題將導致內部一致性降低，故予以保留所有題項；而在「自我價值」與「罪惡感」則是依據前述標準，各刪除 1 題，分別是「S5 我曾經有過自殺的念頭」與「G1 我認為自己不應該讓他人感到受傷」，因此剩餘題項總計有 70 題，並進入因素分析的程序。

在因素分析程序，研究者依據保留的題項進行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平行分析的交叉對照。第一，在主成分分析時，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 .959，屬於極佳適切性，Bartlett 球型檢定 $\chi^2 = 23339.499$ ($df = 2415$, $p = .000$)，其中特徵值大於 1 的因子總計有 11 個、解釋變異量為 67.157%。第二，則是參考平行分析的模型以能協助決定因子數的方法，該模型乃是用模擬的方式求出平均特徵值做為比較基準，將實際數據的特徵值與之相比，若實際特徵值大於平均特徵值，則表示保留此因子 (O'Connor, 2000)，研究者採用 Patil 等人 (2017) 的 parallel analysis engine 作為分析工具。研究分析主成分分析為實際數據，與平行分析的模擬數據比較，在第四個因素之後產生交叉，表示本量表應取四個因素數較為適當。

研究者進一步限定萃取四個因素數，採用主軸因子分析法與 Promax 斜交轉軸法進行因素分析。接著計算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採用因素負荷量 .6 以下刪除，以及第二因素負荷量需小於 .3 作為檢核題項品質的標準。每次刪完題目後，會再進行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確定剩餘題目之品質符合前述因素負荷量之標準。最終研究以 6 次重跑結果作為分析結果之呈現，再刪除題項有：C1、C2、C3、C8、C9、C10、C11、R1、R2、R3、R4、R5、R6、R7、R8、R9、R10、G2、G3、G4、G5、G6、G7、G8、G9、SA1、SA2、SA3、SA4、SA7、SA9、SA10、SY1、SY7、SY8、F8、F9、F10 之題項，總計刪除 38 題題項，最後為 32 題項之量表，詳細題目內容如表一所示。研究者依據各題項的題意與特性，分別為因素一、二、三、四命名為：「自我價值與自信」、「人際互動恐懼感」、「同情他人」、及「人際關係安全感」，最終 32 題項的變異解釋量為 62.46%。



表 1

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之因素負荷量簡表

題項內容	轉軸後因素負荷量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S2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沒用的人	.937	.096	.021	.034
S1 我認為自己沒有存在的意義	.919	.125	.045	.061
S3 我認為自己沒有未來	.885	.086	.017	.038
S7 我認為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沒有意義	.847	.045	.000	.064
S10 我不值得得到他人的喜歡	.845	.020	.027	.065
S6 我從未對自己感到滿意	.836	.012	.067	.102
S4 我認為生命太長	.790	.158	.067	.013
C5 我認為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會失敗	.773	.023	.055	.002
S8 我容易否定自己的感受	.767	.138	.000	.018
C6 我認為自己沒有長處	.760	.086	.066	.078
C7 我認為他人對我的評價都是負面的	.756	.039	.017	.041
S9 我容易產生懷疑自己的想法	.707	.156	.013	.065
C4 我認為自己的能力比不上他人	.699	.166	.084	.042
G10 我時常感到羞愧	.688	.053	.114	.109
G11 我厭惡總是製造麻煩的自己	.658	.106	.075	.117
F2 我害怕與他人發生爭執	.092	.886	.025	.120
F4 我害怕他人情緒失控	.042	.853	.012	.047
F3 我害怕去傷害他人	.107	.849	.062	.092
F6 我害怕改變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132	.685	.035	.092
F5 我害怕重要的人給我負面評價	.053	.647	.058	.271
F1 我害怕在團體中被排擠	.108	.629	.026	.160
F7 我在與他人爭吵時會選擇退讓	.023	.609	.117	.107
SY5 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改變他人的困難處境	.103	.062	.771	.012
SY3 我總是想保護那些看起來弱小的人	.043	.072	.758	.060
SY6 我認為他人的困擾比自己的困擾更需要關注，儘管自己的困擾可能更加迫切地需要解決	.250	.022	.740	.186
SY4 當遇到需要幫助的人，我會放下自己的事去幫助他	.083	.041	.727	-.034
SY2 我總是覺得他人需要自己的幫助	.002	.052	.643	.064
SY10 我時常對他人的際遇感到心疼	.128	.099	.640	.096
SY9 我總是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114	.018	.612	.057
SA6 我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同	.052	.024	.013	.942
SA5 我渴望聽到他人對我的讚揚	.018	.078	.025	.921
SA8 獲得別人的肯定和愛對我而言非常重要	.056	.094	.141	.683

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43，「自我價值與自信」、「人際互動恐懼感」、「同情他人」、「人際關係安全感」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是：.963、.904、.873、與 .894，皆代表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而在整體數據的分配上面，「自我價值與自信」分量表 15 題項 ($M=27.44$, $SD=11.83$)，偏態值為 .86，代表是低分群個體較多的正偏態；「人際互動恐懼感」分量表有 7 個題項 ($M=19.21$, $SD=5.73$)，群體表現為高分族群較多負偏態（偏態值為 -.36）；「同情他人」分量表 7 題項的數值表現 ($M=18.49$, $SD=4.70$)，一樣為高分族群較多的負偏態（偏態值為

-.20)；第四個「人際關係安全感」只有 3 個題項 ($M=8.51$, $SD=2.63$)，一樣為負偏態 (偏態值為 -.44)。而在全量表的呈現 ($M=73.65$, $SD=18.59$)，綜合量表加總屬於正偏態，偏態值為 .19。

二、討論

本研究經文獻整理與分析，掌握情緒勒索的概念與樣貌，藉此發展出適用於華人群體之「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量表經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得到四個因素，其中因素一「自我價值與自信」共 15 題，融合了預試量表中「自我價值」、「自信」、「罪惡感」三個構念之部分題目。因素二「人際互動恐懼感」共 7 題，題項皆來自最初設計之恐懼分量表。因素三「同情他人」共 7 題，皆為預試量表中「同情心」之題目。因素四「人際關係安全感」共 3 題，源自最初設計之安全感分量表中第 5、6、8 題。

本研究針對華人群體探究情緒勒索之內涵，研究結果顯示個體於人際互動中的「自我價值與自信」、「人際互動恐懼感」、「同情他人」、及「人際關係安全感」特質為助長情緒勒索發生之關鍵因素。初始構念中「自我價值」、「自信」、「罪惡感」三者合併成「自我價值與自信」，「恐懼」、「同情心」、「安全感」皆維持原先概念，「責任感」構念被排除。

以華人文化觀點檢視本研究結果，現代華人的自我觀不同於西方文化的個人取向自我，而是兼具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雙文化自我觀（楊國樞，2004；陸洛，2007），華人重視他人的反應與評價、追求社會肯定，並以此來形成自我認識的特性，使得「自我價值與自信」低落者一旦面臨情緒勒索，受到他人言語貶低時容易產生「自己確實不夠好」的認知，進而掉入情緒勒索者的陷阱之中；害怕衝突、強調人際和諧互依、歸屬並融入團體、願意犧牲個人利益以追求集體福祉的處世態度，則展現在「人際互動恐懼感」、「同情他人」、及「人際關係安全感」這三個面向上，情緒勒索者透過主動威脅或被動暗示的方式，使被勒索者害怕傷害對方、造成關係破裂而順從勒索者的一切要求。而華人文化中的「責任感」則較偏向於儒家關係主義強調的角色義務，即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等傳統文化規範，與西方文化基於「互惠規範」（norm of reciprocity）或以自我為責任出發點的權利義務關係並不相同；並且若未履行環境所賦予的角色義務，後續遭他人譴責或排斥所引發的恐懼感與罪惡感，才是華人文化脈絡下情緒勒索行為得以達成目的的原因。

（一）「自我價值與自信」的情緒勒索

「自我價值」與「自信」融合成單一因素，研究者認為原因在於華人認定的「自我」與西方學者以個人主義取向所提出的「自我」並不完全相同，進而影響了華人判斷「自我價值」與「自信」的標準。華人社會的文化基調是集體主義取向的，像是楊國樞等人（2010）認為當前的華人社會是兼具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雙文化社會，個體在發展過程中會形成一種雙文化自我；楊國樞（2004）對此提出「華人自我四元論」，將華人自我分為社會取向自我與個人取向自我兩部分，社會取向自我又再細分為關係取向自我、家族（團體）取向自我、他人取向自我；其中華人之社會取向自我在心理與行為上偏重的是集體主義取向的準則，像是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視與別人維持和諧關係、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希望自己在別人面前有面子、為了自己家庭的福祉願意放棄個人理想等。所以，個

體對於家庭、社會中他人的看法與評價，形成自我價值與自信的呼應。

相對地，當一個人在周遭他人對其看法偏向於負面的時候，自我價值、自信就會偏低，同時意味著個體無法回應他人對自己的期待，進而引發個體的罪惡感，例如：蔡秀娟（2019）認為華人文化強調個人與他人的連結，經常需要覺察或聚焦於重要他人的需求和期待上，以維持彼此關係和諧。而王叢桂與羅國英（2008）認為華人比較在乎他人的看法與評價，而較不重視個人內在感受，華人子女從小接受長輩給予的「羞恥感訓練」，透過學習文化價值中的「羞恥識斷」，來判斷個人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要求，以免於社會的責難。

所以，華人群體相當重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和期待，也較傾向於盡可能順應環境、看重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地位、義務、承諾，並在意自己是否表現出適當的、符合社會規範的行為（陸洛，2003）。因此，研究者認為華人對於自我價值與自信的衡量有相當大一部分是建基於個體從他人處獲得的外在評價。有學者（林杏足，2003；周雨霖，2008）認為個體評價自己的來源除了將表現與自己的期許做對照以外，還有個體知覺到他人對自己的看法、體驗到重要他人的觀點與回饋，而形成對自我的認識。個人在成長過程中會被教導社會的價值與標準，並運用觀點取代的能力，觀察父母與重要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這些社會文化、他人觀點的標準會成為個人評價自己表現和能力的重要參照（林杏足，1997）。

從華人文化的觀點來看，滿足他人期待與得到優良的外界評價對個體而言非常重要，若個體的表現無法得到他人的肯定和讚賞，甚至獲得負向回饋，會使個體產生羞恥感與罪惡感，他人對自己的否定或批評會內化成自己對自己的負向評價，使自我價值感和自信受損。自我價值與自信都被視為是建構自我的重要面向（劉鳳娥、黃希庭，2001），有學者（任志洪、葉一舵，2009）認為自信、自尊、自我效能感、自我價值這四個概念有互相重疊，較難以清楚區分，彼此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他人批評所引發的罪惡感則是影響個人衡量自我價值與自信的主要因素。所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將「自我價值」、「自信」、「罪惡感」三個構念收斂在一起。

（二）「人際互動恐懼感」的情緒勒索

恐懼的概念本就包含在情緒勒索的初始定義中（Forward & Frazier, 1998），尤其是人際之間的恐懼，可能會產生無助感、被拋棄感，進而使人陷入被情緒勒索的互動模式。目前大部分研究皆是聚焦在職場人際互動的利害關係（艾昌瑞等人，2015；林瑞塘，2014；柯小萍，2009；陳怡伶，2004；陳怡伶等人，2005；孫蓁蓁，2020；Liu, 2010），換言之，人際互動有直屬上下關係、或者職務直接影響的時候皆有可能經驗到情緒勒索經驗，進而破壞原本關係的本質，如同 Al-Omari（2020）的研究指出，組織的情緒勒索與信任關係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代表情緒勒索會破壞關係。所以，在本研究中人際互動所帶來的恐懼感被獨立出來，成為情緒勒索感受中很重要的指標之一。

（三）「同情他人」的情緒勒索

而「同情他人」因素則是「同情心」的構念。華人社會價值觀深受儒家文化影響，其中孟子主張性善說，強調「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意指惻隱之心是每個人內在具備的良

善能力。事實上「惻隱之心」就是「對人危難的同情心」，是對他人不幸的遭遇油然而生的不忍人之心（施宜煌、林麗卿，2016）。華人族群從小接受以孔孟思想為主的道德教育，被要求培養同情心、學會憐憫弱者，甚至必須要向他人伸出援手、救助對方。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助人」是一種美德，先人後己、排他人之憂被視為是值得鼓勵和讚賞的行為準則，甚至有「捨身救人」、「殺身成仁」等崇尚犧牲自我以救助他人的觀念。因此個體會因同情、憐憫他人而出現自己必須為他人的請求或困難負起責任的想法，甚至會順應傳統文化中捨己為人的價值觀，選擇犧牲自己的情緒感受與利益，做出幫助他人、替人分憂解勞的行為。

（四）「人際關係安全感」的情緒勒索

相對於人際關係擔心他人評價、罪惡感、威脅、同情他人，在情緒勒索中亦具有個體在人際關係中的需求，像是「我渴望得到他人的認同」、「我渴望聽到他人對我的讚揚」、「獲得別人的肯定和愛對我而言非常重要」，都是為了在人際關係中企圖獲得他人好的評價。所以，接受他人的情緒勒索除了是想要逃離不舒服的人際狀態外，也有可能是為了獲得好的人際評價所做的犧牲，想要的可能是認同、愛、關係、工作、名聲等（周慕姿，2017）。如同蔡秀娟（2019）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華人社會的親密關係中，當個人於關係中感受到的愧疚感越高時，越容易採取順從行為以滿足伴侶需求；感受到的義務感越高時，越容易覺得關係中的兩人是親近的、維持關係的意願也越高。

另外，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年齡跨越多個世代，最年輕 18 歲，最年長 53 歲，有 51.8% 的參與者年齡介於 18 至 34 歲之間，目前有針對不同世代在情緒智能認知與表達上的研究（王叢桂，2007）顯示年輕世代（1981 年後出生）相較於年長世代，較敢於坦露情緒與聆聽、重視情緒管理與人際互動中的和諧，並且該研究推測大學生在大學中會被鼓勵學習表達自我與練習控制情緒。此外，依照 Erikson（1968）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青春期末至成年早期是正在建立自我認同與親密關係的階段，因此可能會更關注自己與他人互動中的情緒及想法、渴望維持關係。上述因素可能導致該年齡段的研究參與者在人際互動特質上的展現有別於其他年齡層，進而影響後續研究結果。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從文獻歸納出情緒勒索有：自信、自我價值、恐懼、責任感、罪惡感、安全感、及同情心等七個構念；預試量表經過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後，最終形成共 32 題項之「情緒勒索人際互動特質量表」，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43，變異解釋量為 62.46%。研究結果發現華人文化的情緒勒索包含四個面向，分別為「自我價值與自信」、「人際互動恐懼感」、「同情他人」、及「人際關係安全感」。

其中預試量表中「自我價值」、「自信」、「罪惡感」三者概念融合在一起，合併為「自我價值與自信」因素，代表華人之自我價值、自信與罪惡感較難以從情緒勒索過程中區分出來；其餘「人際互動恐懼感」、「同情他人」、「人際關係安全感」部分則維持原概念。而責任感也未包含在華人情緒勒索的認知中，反倒以同情他人的方式出現，先是以

他人的處境為出發，而非以自身的責任為主要考量，換言之，華人在情緒勒索是被動感知大於主動感知。

二、建議

本研究從個體的主觀知覺出發，形成在情緒勒索人際互動中涉及的重要因素，並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作為受情緒勒索議題困擾者、專業助人者以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依據。

（一）對受情緒勒索議題困擾者的建議

面對各種人際關係中的情緒勒索行為，受情緒勒索者會被引發許多負向的心理感受，情緒勒索者之所以能勒索成功，在於其掌握了對方在人際互動中渴望被滿足的需求，像是愛、認同、價值感、歸屬感等；此時被勒索者或能從「自我價值與自信」、「人際互動恐懼感」、「同情他人」、「人際關係安全感」四個面向檢視自己，意識自己內心真正的需求，學習降低需求對自我的影響力，或尋找其他能滿足內在需求的替代管道，並以正向的態度去調適因需求而產生的負向情緒，對因應情緒勒索情境會有很大的幫助。

（二）對實務工作者的建議

諮商輔導相關專業之實務工作者在與涉及情緒勒索議題的當事人工作時，可以協助當事人提升在人際互動中的自我覺察，釐清當事人對關係的看法和關係背後的需求，從「自我價值與自信」、「人際互動恐懼感」、「同情他人」、「人際關係安全感」四個面向探討其陷入情緒勒索的原因，幫助當事人提升自我概念、賦權增能，發展出合適的因應策略。例如：在與不斷落入家庭暴力循環的婦女工作時，可以從四個因素的面向去探討無法離開關係的在意原因，像是在乎社會評價與觀感、對於家庭的責任與罪惡感、抑或想要補償與修復之前親密關係的創傷經驗，才能為後續心理專業服務提供目標與方向。而對諮商專業學習者而言，則可以藉由四個因素的內涵，了解被情緒勒索者的性格特徵，學習辨識各種情境脈絡中潛藏的情緒勒索現象，將有助於學習者增進對情緒、關係的知覺敏銳度。

（三）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本研究礙於經費與人力，無法在完成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後，再以正式量表進一步蒐集資料完成驗證性因素分析與常模建構，後續研究可以本量表題項為基礎，並納入多元專家的討論與檢核，持續建構更完整的量表結構，並且針對不同年齡層或不同屬性族群進行研究，例如：18 歲以下、中老年人、受家庭暴力對待的婦女、非主流住民的移居族群、或者一般學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學生等，將能夠進一步探索各年齡層與各族群在人際互動關係中的主觀感受，形成建議後締造更友善與完備的生活環境。

參考文獻

方志揚（2019）。校園開放、環境知覺、安全感受與學生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服務業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 王秀槐（2015）。從「以我為榮」到「證明自己」：華人文化脈絡下知覺不同父母期待之大學生的生涯因應組型初探研究。**輔導與諮商學報**，37(1)，79-97。
- 王叢桂（2007）。不同世代與專業的工作者在情緒智能認知與表達上的差異性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E93003）〔研究計畫專案〕。東吳大學心理學系。<http://doi.org/10.6141/TW-SRDA-E93003-1>
- 王叢桂、羅國英（2008）。華人對情緒智能與人情世故的認知：性別與世代的差異。**應用心理研究**，39，215-251。
- 石中英（2010）。全球化時代的教師同情心及其培育。**幼兒教保研究**，5，41-55。
<http://doi.org/10.6471/jecec.201010.0041>
- 任志洪、葉一舵（2009）。核心自我評價量表的中文修訂。**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4），157-163。
- 任庭儀（2018）。親代對子代的情緒勒索經驗：未婚成年子女之觀點〔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 艾昌瑞（2015）。職場情緒勞動忽略的角落：情緒勒索概念分析與量表建構。（科技部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MOST103-2410-H194-123-SSS）〔研究計畫專案〕。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學系。<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8358556>
- 李政忠（2004）。網路調查所面臨的問題與解決建議。**資訊社會研究**，6，1-24。
<http://doi.org/10.29843/JCCIS.200401.0002>
- 周雨霖（2008）。大學生強迫購買傾向與其自尊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 周慕姿（2017）。情緒勒索。寶瓶文化。
- 林杏足（1997）。諮商中當事人自尊改變歷程之分析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
- 林杏足（2003）。青少年自尊量表編製報告。**測驗學刊**，50（2），223-256。<http://doi.org/10.7108/pt.200312.0223>
- 林佳樺、姜定宇（2019）。華人角色關係的情緒表達規則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51，169-228。[http://doi.org/10.6254/IPRCS.201906_\(51\).0004](http://doi.org/10.6254/IPRCS.201906_(51).0004)
- 林瑞塘（2014）。雲林縣國小教師受情緒勒索類型及職場情緒勒索與工作壓力之相關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 林鳳琪、王忻珏（2017，5月4日）。不聽你的又怎樣？。今周刊網站：<https://www.business 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705040010/%E4%B8%8D%E8%81%BD%E4%BD%A0%E7%9A%84%20%E5%8F%88%E6%80%8E%E6%A8%A3%E5%BC%9F>
- 施宜煌、林麗卿（2016）。孟子「惻隱之心」思想探析。**通識論叢**，19，31-43。
- 柯小萍（2009）。職場情緒勒索與社會支持對工作績效影響之探索性研究——以中部五金產業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 孫蓁蓁（2020）。組織中主管對部屬情緒勒索之研究：部屬知覺量表編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論文〕。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張良才、孫繼紅（2006）。山東省高中生責任心現狀的調查研究。**教育學報**，2（4），82-90。

張春興（2011）。**張氏心理學辭典**。東華。

許喻淇（2013）。**情緒智力、職場情緒勒索知覺與因應之關係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陳怡伶（2004）。**職場情緒勒索認知與員工效能關聯性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實踐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陳怡伶、劉仲矩、方國榮（2005）。職場情緒勒索來源內容分析之研究。**東吳經濟商學學報**，51，157-180。

陳思婷（2020）。**仁慈領導下的情緒勒索現象——以軍隊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心理碩士班。<https://hdl.handle.net/11296/rm2pm9>

陳順森、葉桂青、陳偉靜、李倩、夏春燕、向萍、鄒德蓮（2006）。大學生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編製。**中國行為醫學科學**，15（12），1142-1144。

陸洛（2003）。人我關係之界定——“折衷自我”的現身。**本土心理學研究**，20，139-207。
<http://doi.org/10.6254/2003.20.139>

陸洛（2007）。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概念分析與實徵測量。**US-China Education Review**，4（2），1-23。

陸洛、高旭繁、陳芬憶（2006）。傳統性、現代性、及孝道觀念對幸福感的影響：一項親子對偶設計。**本土心理學研究**，25，243-278。

彭惠鈺（2020）。**探討霸凌旁觀者的知覺嚴重度、挺身自我效能、罪惡感與怪罪受害者的挺身行為調節關係**〔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

程致綱（2014）。**自信與團隊決策之理論模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經濟學系碩士班。

黃光國（2004）。儒家社會中的生活目標與角色義務。**本土心理學研究**，22，121-193。
<http://doi.org/10.6254/2004.22.121>

黃燕茹、李世凱、柯貞如、黃湘淳（2019）。**情緒勒索對於家庭互動關係的影響——以酒精使用障礙症個案之家屬為例**。（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10851）。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https://www.grb.gov.tw/search/planDetail?id=12967454>

楊國樞（2004）。華人自我的理論分析與實徵研究：社會取向與個人取向的觀點。**本土心理學研究**，22，11-80。

楊國樞、劉奕蘭、張淑慧、王琳（2010）。華人雙文化自我的個體發展階段：理論建構的嘗試。**中華心理學刊**，52（2），113-132。<http://doi.org/10.6129/cjp.2010.5202.01>

廖佩珊、蔡易佑（2014）。國中生寵物飼養與責任感之相關性研究。**數據分析**，9（2），69-82。[http://doi.org/10.6338/jda.201404_9\(2\).0005](http://doi.org/10.6338/jda.201404_9(2).0005)

- 劉仲矩（2012）。顧客知覺員工服務破壞行為之研究：情緒勒索觀點。《美容科技學刊》，9（2），5-23。 <http://doi.org/10.30001/jies.201206.0001>
- 劉仲矩、莊心宜（2016）。消費者情緒勒索知覺與購買意願關聯之研究——以自尊為干擾變數探討。《行銷評論》，13（2），185-215。
- 劉國華、張積家（1997）。論責任心及其培養。《魯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7-72。
- 劉鳳娥、黃希庭（2001）。自我概念的多維度多層次模型研究述評。《心理學動態》，9（2），136-140。
- 蔡秀娟（2019）。《華人文化裡情緒勒索對親密關係的影響：以關係承諾為調節變項》〔未出版之碩士論文〕。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 譚小宏、秦啟文（2005）。責任心的心理學研究與展望。《心理科學》，28（4），991-994。
- 嚴心好（2020）。《網路社群情緒勒索知覺、網路社群心理壓力與退社群傾向之關聯性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 Al-Omari, A. A. (202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ulty members' perception of Emotional blackmail and their organisational trust in Jordanian Univers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Change*, 13(10), 994-1011. <http://doi.org/10.33687/educ.006.01.3218>
- Basch, C. E. (1987).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 underutilized research technique for improv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alth education.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14(4), 411-448. <https://doi.org/10.1177/109019818701400404>
- Bybee, J. (1998). The emerg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guilt during adolescence. In J. Bybee (Ed.), *Guilt and children* (pp. 113-125).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148610-5/50006-0>
- Chen, S.-Y. (2009). Types of customer emotional blackmail perceived by frontline service employee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7(7), 895-903. <https://doi.org/10.2224/sbp.2009.37.7.895>
- Chen, S.-Y. (2010). Relations of machiavellianism with emotional blackmail orientation of salespeople.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5, 294-298.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0.07.091>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social*. Norton.
- Forward, S., & Frazier, D. (2017)。《情緒勒索：遇到利用恐懼、責任與罪惡感控制你的人，該怎麼辦？》（杜玉蓉，譯）。究竟出版。（原著出版於 1998）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341000077>
- Karnani, S. R., & Zelman, D. C. (2019). Measurement of emotional blackmail in couple relationships in Hong Kong. *Couple and Family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8(3), 165-180. <https://doi.org/10.1037/cfp0000126>
- Liu, C.-C. (20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emotional blackmail and

- their well-being.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5, 299-303. <https://doi.org/10.1016/j.sbspro.2010.07.092>
- O'Connor, B. P. (2000). SPSS and BAS programs for determining the number of components using parallel analysis and Velicer's MAP test.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ation, and Computers*, 32, 396-402. <https://doi.org/10.3758/BF03200807>
- Olthof, T., Ferguson, T., Bloemers, E., & Deij, M. (2004). Morality and identity-related antecedents of children's guilt and shame attributions in events involving physical illness. *Cognition and Emotion*, 18(3), 383-404.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341000077>
- Patil, V. H., Surendra, N. S., Sanjay, M., & Todd, D. (2017). Parallel analysis engine to aid in determining number of factors to retain using R. Available from <https://analytics.gonzaga.edu/paralleleengine/>
- Schein, E. H. (2010).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Vol. 2). John Wiley & Sons.
- Schlenker, B. R., Britt, T. W., Pennington, J., Murphy, R., & Doherty, K. (1994). The triangle model of responsibi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101(4), 632-65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101.4.632>
- Schmidt, W. C. (1997). World-wide web survey research: Benefits,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Instrument and Computer*, 29, 274-279. <https://doi.org/10.3758/BF03204826>
- Sullivan, H. S. (1953).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W. W. Norton & Co.
- Weinberg, B. A. (2009). A model of overconfidence.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4(4), 502-515. <https://doi.org/10.1111/j.1468-0106.2009.00466.x>

Construction of the Emotional Blackmai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rait Scale

**Wang, Chien Wen¹ Chen, Pin Chieh^{2*}
Yeh, Szu Yu² Wang, Yu Chun² Hsing, Chih Pin³**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¹

Under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²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nd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³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emotional blackmail in recent year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concept and phenomenon of emotional blackmail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n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aims to develop a self-testing scale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motional blackmai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in the hope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blackmail in society. This research was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even factors and 72 items for the Emotional Blackmai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rait Scale pre-test. In the second stage, adults over the age of 18 in Taiwan were recrui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a total of 438 responses from qualified subject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scale was constructed by removing two items after item analysis and 38 items afte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four factors were extracted which finally formed the "Emotional Blackmai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rait Scale" with 32-item. This scale consisted of 15 items on "self-worth and self-confidence", seven items on "fear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even items on "empathy for others", and three items on "interpersonal security", with overall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of .943 and 62.46% of variance explained.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Emotional Blackmail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Trait Inventory contains four dimensions: (1) self-worth and self-confidence, (2) fear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3) empathy for others, and (4) interpersonal security. Finally,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result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scale and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Emotional blackmail, Emotional perceptio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Scale Construction